

013584

梁河县教育志

梁河县教育局编



云南美术出版社

梁河县教育志

梁河县教育局编

云南美术出版社

《梁河县教育志》编写领导小组成员

(1985~1988 年)

组 长 高占先

副组长 赵家富(阿昌族) 瞿忠田 王美芳

编 辑 夏新鼎 瞿忠田 吴锦泉 杨恩恕

摄 影 刘生锦

《梁河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1989~1995 年)

顾 问 龚运麟(县长、傣族)

主 任 岳品勋(1989~1993.3,高占先退休,岳品勋继任)

万世祜(1993.4~1995,岳品勋卸任,万世祜继任)

副 主 任 万世祜(1990.6~1993.3) 岳品勋(1993.4~

1995) 赵家富(阿昌族) 杨兴茂(傣族)

《梁河县教育志》编写领导小组成员

(1985~1988 年)

组 长 高占先

副组长 赵家富(阿昌族) 瞿忠田 王美芳

编 辑 夏新鼎 瞿忠田 吴锦泉 杨恩恕

摄 影 刘生锦

《梁河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1989~1995 年)

顾 问 龚运麟(县长、傣族)

主 任 岳品勋(1989~1993.3,高占先退休,岳品勋继任)

万世祜(1993.4~1995,岳品勋卸任,万世祜继任)

副 主 任 万世祜(1990.6~1993.3) 岳品勋(1993.4~

1995) 赵家富(阿昌族) 杨兴茂(傣族)

委 员 高占先（退休干部） 瞿忠田 段一全
赵家义（阿昌族） 夏新鼎 吴锦泉
刘生锦 番家昌 张顺勋 张顺动
杨恩恕（退休教师） 尹培礼

办公室主任 夏新鼎

《梁河县教育志》编辑人员

（1989～1995 年）

主 编 夏新鼎

编 辑 吴锦泉 瞿忠田 夏新鼎

摄影绘图 刘生锦

委 员 高占先（退休干部） 瞿忠田 段一全
赵家义（阿昌族） 夏新鼎 吴锦泉
刘生锦 番家昌 张顺勋 张顺动
杨恩恕（退休教师） 尹培礼

办公室主任 夏新鼎

《梁河县教育志》编辑人员

（1989～1995 年）

主 编 夏新鼎

编 辑 吴锦泉 瞿忠田 夏新鼎

摄影绘图 刘生锦

序 一

高占先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千百万有政治、技术和文化教养的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经济贫弱是教育落后的集中反映，它同时也说明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特别是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的今天，学校教育肩负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建设人才的光荣使命。随着历史的变革，经济的发展，教育也在不断地发展。解放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把教育视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工程，列为战略重点。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因此，不重视教育的领导是没有远见的领导、不成熟的领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振兴中华，已为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所共识。

梁河教育历史，道路漫长而又曲折，经历了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历程。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与“左”的路线以及传统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作斗争。在“读小学不出村，读中学不出大队，‘县上自己办大学’”的错误口号影响下，违反了教育规律，致使梁河教育倍受摧残。粉碎“四人帮”之后，梁河教育获得了新生。经过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拨乱反正，结合梁河实际拟订并认真贯彻落实了《梁河县教育系统岗位职责》，各级各类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迅速建立，提出了“收缩高中，调整初中，提高质量，大力普及初等教育”的明确要求。本着“积极发展量力而行，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实事求是明确宗旨”的指导原则，调整了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端正了办学思想，坚持为社会服务，坚持改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使全县教育恢复了生机。教学秩序明显好转，教育质量迅速提高，师资队伍增强了，教育事业稳步地向前发展。

广大教职工和全县各族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探索前进。目前，改革教育已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按教育规律办教育，加强科学管理，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不断得到革新；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已在全县范围内得到了贯彻落实；一个群众性的办学热潮正在兴起；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改革正在全县顺利进行；一个全党办教育，全民支持学校，人人关心教育改革的新局面已经出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鉴现实，洞察过去，预见未来。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而历史就是前人的实践，因此，认真总结梁河教育历史，促进、推动现在和将来的教育事业，实为振兴梁河教育的当务之急。

让我们共同阅读这部《梁河县教育志》从中吸取改革教育、推动教育的精神和力量，为振兴梁河经济，改革梁河教育，进一步开创梁河教育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1993年4月

13

序 二

岳品勋

《梁河县教育志》是一部记载着上自清代嘉庆年间，下至 20 世纪 90 年代，跨越近两个世纪的文献。它汇集了梁河教育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史料，纵横交错，信息宏大，编排合理，资料翔实，记述得当，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不失为资治、存史、教化的辅治之书，对于“服务当代，借鉴未来，惠及子孙”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它既可以作为研究梁河教育历史、教育发展规律的宝贵资料；也可作为将来制定梁河教育发展规划和教育决策的依据。这本由红烛的光和热凝聚而成的志书，足以慰师魂，叹古今，励后人。

然而，在梁河的历史长河里，不要说没有一本专门记述梁河教育发展演变的著作，就连成篇的资料也难以找寻。所以，《梁河县教育志》的问世，可以说，又是梁河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梁河县教育志》于 1985 年组建写作班子，经过广泛征集资料，反复推敲和订立篇目试写，1988 年形成初稿。后又延长下限，革新志体、精简内容、压缩篇幅，几经增删、修改，使之达到新方法、新观点、新体制的要求。在编写过程中，编著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理论，反复考证、比较、概括、提炼，集中突出了社会主义时代特点、教育改革特点和边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地方特点，起到总结教育的历史经验，反映教育的发展规律的作用，并使之臻于完善。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梁河县教育志》的问世，应当说是为梁河教育史志填补了空白，可以说是一部价值较高的资料文献，是梁河广大教育工作者必读之书。不了解梁河教育历史发展的教育工作者，是难以搞好梁河的教育改革的。我衷恳地希望全县教师、教育工作者认真读一读这本书，以之达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使梁河教育更好地为梁河经济建设服务，更加圆满地共同写好未来梁河教育志书的续篇。

1993 年 4 月 3 日

序 三

龚运麟

县教育局编纂的这部《梁河县教育志》要我作序，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几年来，虽分管教育，毕竟不及教育第一线的同志对梁河教育有真知灼见。这部书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是梁河唯一的一部反映和记载梁河教育文献史料的著述，更不待说书中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编排合理，足见编著者的用心良苦。

地方志是科学资料的宝库，是民族文化的遗产，所以受到科学家们的青睐，也受到历代达官的重视。据传：唐朝韩愈南行，过梅岭先借阅《韶州图经》，宋人朱熹知南康军，下车之始首先访问志书。这也充分说明志书在政治上的意义重大。

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和观点，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志书政治标准，也是灵魂之所在。《梁河县教育志》按照“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的原则，既考虑梁河人民在教育史上的贡献，也客观地体现历史上土司、设治局对教育的是非功过，各界有识之士对教育所作的努力，更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梁河教育飞跃发展的历史业绩。

总之，志书力求做到贯通古今、门类齐全、纵陈一地教育的启始、发展过程，具备部门志的体例。字里行间，倾注着梁河古今教育工作者艰苦创业和教书育人的苦乐观。这部志书既可以为本县各级领导提供教育决策的科学依据，也可以作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还可供专家、学者研究一地教育科学的基本情况，以及在全国各地工作的家乡人，以及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了解本县教育情况之用。

观后掩卷，使人产生无穷无尽的遐思，作为一个梁河人，作为一名梁河的干部，应当为造就梁河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做些什么？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教。梁河教育志笔端止于1990年，今后的教育志要靠全县人民和全县教师、职工、尤其是各级领导去续写。我们希望今后的志书内容比现在的《梁河县教育志》所载内容更充实，教育成就更加喜人。

1993年4月7日

14

序 四

万世祜

盛世修志，《梁河县教育志》正是逢此机遇而问世。

梁河教育发展到今天，有据可查的历史近 200 年，但此端历史的发生、发展、演变、兴衰、得失都从未见过专门的系统的史书记载，这不能不是梁河教育史上的一件憾事。《梁河县教育志》的编写和出版正好做了这一空前的工作，为梁河教育办了一件大好事，是梁河教育史上的重大成果，其贡献价值将随时间的推移更加显见。

教育给人类社会以文明。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可以说是教育的发展史，没有源远流长的中国教育历史，怎会有今天如此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给国人以自豪。教育的重要在于保存和发扬文化“火种”以传递文明，在于培养各种人才以致国强民富，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的历史过程。世代师生的传道授业使这一过程得以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中华民族的国民教育如此，梁河县的地方教育同样如此。《梁河县教育志》基本展现了梁河教育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过程，记述了梁河教育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历史，是一部研究梁河教育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的资料性著述。要想办好梁河的教育，必须懂得梁河教育的历史，要想懂得梁河教育的历史，不能不读这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梁河县教育志》。凡志立于梁河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一定会珍视这部教育著述，并从中得到借鉴和启示。

有幸参与这部教育志的编纂领导工作，是一大荣幸，是历史赋予的责任，也是历史的机遇。梁河县教育局三届领导，承前启后，协同编写人员经 8 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重任，可以说是无愧于梁河这块热土，无愧于梁河各族人民，无愧于历代致力于梁河教育事业的先辈，无愧于梁河的子孙后代。在此志书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最后一届编委，对为此书付出心血的各届领导、编纂人员和关心支持编写出版这部志书的各界人士以及为梁河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历代教育工作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即此写了以上难尽衷情之言，权当作序，实难为序。

1995 年 1 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史观进行编写。编写中力求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期实事求是地反映梁河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起到保存地方文化遗产，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决策的依据，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资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为梁河县首部教育志。按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实事求是的原则追溯上限，上限起自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下限截至1990年，个别事件的下限略有延伸。

三、本志坚持秉笔直书，所用史料宁缺存疑，不主观推断臆造，缺疑之处留待后考补正。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体形式，以章统目，横排门类，竖写始末，分类立目，以类系时，贯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于全志，以志为主，图表分附于有关章节之中。

五、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明，杜绝一切假话、空话、大话、套话。引用和记述文献资料，档案史料，口碑材料忠实无误。

六、本志《大事记》力求大事突出，要事不漏，取粗舍细，反映梁河教育历史发展轮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关教育的政治运动，亦载入《大事记》中，不另立章节。《大事记》采用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的体例。

七、清朝、民国年号、纪元按历史习惯记述，并在其后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年代均书以全数，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八、使用时间代名词，如“当年”、“是年”、“是日”、“翌日”、“当时”、“同时”、“之后”均承袭上文时间而言。“解放前”、“解放后”以1950年5月6日梁河县和平解放为中界。“文化大革命期间”指1966年5月~1976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1978年以后。

九、地址、乡村、学校、机关名称、行政官佐职务名称按当时当地历史习惯称呼。志书中所涉及的“组织上”、“领导”、“上级”等，均指负责教育的有关党委、行政长官。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如“云南省教育厅”简称“省教厅”，“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梁河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中国共产党梁河委员会”简称“县委会”，“招生办公室”简称“招生办”或“招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简称“党的领导”等。

十、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对梁河县教育历史发展有贡献、有影响的过世人物给予立传或简介；在世的教育先进人物反映在有关章节中。

十一、本志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以现属梁河县管辖的学校为主，原属梁河而现已划为外县的学校，只记其原属梁河时的情况。

15

概 述

梁河居滇西之边，原属南甸土司，旧隶腾越，而统属于永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归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管辖。地理位于东经 $98^{\circ}06' \sim 98^{\circ}31'$ ，北纬 $24^{\circ}31' \sim 24^{\circ}58'$ 之间，县境南北纵距 49 公里，东西最大横距 45 公里，总面积 1 159 平方公里，居腾冲、龙陵、潞西、陇川、盈江 5 县之中。境内汉、傣、阿昌、景颇、德昂、傈僳、佤等多种民族杂居。1990 年底，全县共有人口 141 565 人，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30.1%。

梁河历史晚开，凡方志所关之事，仅散见于腾越、永昌各志或南甸司刀龚氏家谱，具体自成史册者至今还未发现。至于梁河古代文化教育历史的记载，更是凤毛麟角。据明初钱古训，李思聪所著《百夷传》记述“金齿（指保山、德宏地区）百夷（指少数民族），记识无文字，刻木为约。”可见明朝时期当地文化教育状况的原始程度。

清朝嘉庆年间，梁河始设义学馆，而民间早已办有私塾，数量甚少，发展缓慢。清朝末年，废科举办新学，学堂教育制度产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梁河始办初等小学 1 堂，嗣后渐有发展。宣统 1 年（1909）又筹建土民学塾 2 校，此为梁河少数民族教育之始。民国初年，改学堂制度为学校制。至民国 23 年（1934），全县办有初、高等小学各 8 校（南甸司呈《云南南甸地志征集资料》）。此外，还有法国传教士所办教会小校 1 校。民国 24 年（1935），云南省教育厅设立省立梁河小学，对梁河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民国 34 年（1945），梁河设治局创办各乡镇国民学校，次年，全县计有国民学校 51 校，学生 3 300 余名，到民国 38 年（1949），除原属腾冲的九保、河西、曩宋地区外，全县有初等小学 31 校，两等小学 8 校共计小学 39 校，在校学生 2 013 人，教师 71 人。

综民国期间梁河教育事业的发展，大体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情况。一是原属腾冲的九保、河西、曩宋地区，因地处大盈江沿岸，交通便利，生产力水平相应较高，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加之受腾冲影响，办学较早，基础较好，师资力量雄厚，教育事业相应发达；二是遮岛、萝卜坝、小陇川等土司直属地区，由于产力水平较低，经济贫困，再加上土司长期实行愚民政策，教育发展比较落后；三是大厂、河东、平山、杞木寨等山区、半山区，设治局权力直达，且多为汉族居住，教育发展情况介于上述两类地区之间。可见全县教育发展极不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边疆民族教育的发展。在 1950~1990 年的 40 年间，中共梁河历届县委及其人民政府为迅速改变本县教育落后面貌，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作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其间，虽经受 1957~1960 年和 1966~1976 年“左”的错误思想干扰，使梁河教育事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但从历史的总体角度来看，毕竟是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失误。经过 40 年（1950~1990 年）

的艰苦奋斗，取得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梁河教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一 1950~1966 年是梁河教育稳步发展，排除干扰，奋力前进，卓有成效的 16 年

1950 年 5 月 6 日解放大军进驻梁河，5 月成立梁河各民族行政委员会（相当于县人民政府），随即设立梁河县教育科（后改文教科）主管全县教育工作。县文教科配合各级人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接管、整顿、改造旧学校和发展创建新学校。1951 年底，云南省教育厅拨专款在傣族聚居的萝卜坝芒东成立省立梁河小学，为发展梁河民族教育作出示范并奠定基础。同时，县人民政府还积极鼓励和支持地方群众团体和个人开设民办和私立小学，以满足全县各族人民在解放后迫切要求子女入学的愿望。1952 年，县文教科对现有的小学进行了初步调查，将其中的 22 所小学接收合并为公立小学，33 位教师接收为公办教师。1953~1954 年间，县文教科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通过调查研究，对全县小学布点作了进一步调整，先后开设了罗岗傣族完全小学、丙介阿昌族中心小学、勐来民族联合小学等一批少数民族学校。接收了一批民办、私立小学为公立学校，撤销合并了部分初级小学，增设了完全小学布点。1956 年，创办梁河县初级中学，结束了梁河县无中学的历史。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在恢复、接管、改造和整顿旧学校创建新学校的同时，对学校的政治领导和业务管理工作更为重视。动员组织教师参加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等政治运动，接受思想改造；利用假期召集全县教师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业务培训，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使教师明确祖国的发展前途，安心于边疆民族教育事业；学校为工农开门办学，优先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取消训育主任制度，废止体罚教育；改革旧的学校体制，废除“党义”、“公民”等课程和“童子军”组织，增设“政治常识”、“手工劳动”等课程，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观点；学校领导和教师职责分明、互相支持，领导关心教师，教师尊重领导，全体教师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学生尊敬教师、学习刻苦努力，社会尊师重教，群众办学热情空前高涨，一大批新型学校办得生机勃勃，教学秩序井井有条，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到 1956 年底，全县有中学 1 所，小学 57 所，在校小学生 5 553 人，工农子女占学生总数的 82%，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23.5%，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前的 20% 增长到 40% 略强，教职工数由解放前 71 人增加到 220 人（包括民办教师）。

1957 年底，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严重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真诚的建议，工作中不同的见解和争执被无限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行而划为“右派分子”，程度不同地毁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而又愿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的人才，使梁河的教育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1953~1960 年，在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的过程中，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

16

“教育大革命”，旨在“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全县创办了一批半工（农）半读学校，各类学校普遍建立了校办小工厂、小农场、小饲养场，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师生在劳动中受到锻炼和教育，为全县后来教育改革的发展开拓了一些新途径。但是，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干扰，当时的“教育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突出政治为中心，忽视教育发展规律，加之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五风”，对党的教育方针不是全面贯彻执行，而是片面理解，大搞形式上的“服务”与“结合”，要求全县各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都必须服从于社会上的中心工作，即大炼钢铁、支援农业“三秋”、兴修水利、开展“四化”（思想革命化、组织纪律化、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致使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师生劳动时间过多，重劳动，轻学习，以干代学的现象被错误地认为是“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具体体现，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最好方法。结果课堂教学、基础教育被忽视，教育质量急剧下降。在“教育大革命”中，为了体现“教育大跃进”，县委还提出“书记挂帅，全民动手，苦战一个月，实现文化县”的口号。之后，农业中学、农村幼儿园、各类型识字班如同“雨后春笋”遍布全县。为了实现文化县，扫盲工作突击进行，中小学师生全力以赴投入办夜校、设识字岗的扫盲大会战中，这对扫盲工作和社会教育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学校基础教育被忽视，形成本末倒置的恶性循环。

1961年以后，通过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梁河教育基本克服了教育革命中出现的任意发展，比例失调，重劳轻教的盲乱现象，学校教育工作逐步走上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1963年中央制定的《全日制小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公布以后，梁河各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有章可循，教学秩序明显好转，教育质量迅速提高。1964~1965年，梁河县委、县人民政府积极贯彻中央“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指示，学习原阳县普及教育的先进经验，着力普及教育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全县的办学布点作了统筹安排，采取了多种办学形式，办起了一批城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组织了一批“自愿兵”到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去开办学校，担任民办、耕读学校教师，大大推动了全县边远山区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普及小学教育奠定了基础。原梁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匡大一为贯彻“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发展梁河教育事业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具体工作，至今在广大教师中仍留下深刻印象。到1966年上半年，全县有普通中学1所，学生444人，职业、农业中学5所，学生293人，各种类型小学253所，学生13449人，适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93.6%，至此梁河教育体系初具规模。

二 1966年6月~1976年10月是梁河教育惨遭破坏的10年

在10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梁河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梁河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停课闹革命”，各种“造反组织”应运而生。“扫四旧、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代替了学校教学工作；学校领导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统统“靠边站”；广大教师被视

为“牛鬼蛇神”而关进“牛棚”；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青少年的心灵完全被扭曲，成了受害最深的牺牲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被践踏，广大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摧残；前16年行之有效的学校教学制度、良好的教学秩序完全被否定和搅乱；继之而起的是盲目发展、办学升级、不顾客观条件和教育规律提出了“读小学不出村、读初中不出大队（相当于村）、读高中不出公社”，使教育呈现数量剧增、质量剧降的状态。

三 1976年10月~1990年是梁河教育的复兴和改革发展时期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全国上下百废待兴，梁河教育迎来了春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教育战线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彻底批判、全面否定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及其“两个错误估计”，解除了广大教师的精神枷锁，为复兴梁河教育事业创造了前提条件。各级党委、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激发了教师的积极性；国家增加教育投入，群众集资办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新生的招生制度；重视教师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学校管理；改进教学方法，教育质量迅速提高；梁河教育事业迅速恢复发展。

1978年，县文教局从实际出发，针对本县中小学比例失调虚浮臃肿的状况，提出了“小学要普及、初中要调整、高中要压缩”的办学方案。通过对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比例调整和合理布局，腾出了一批初中教师加强了小学教育，一批高中教师加强了初中教育，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比例大体协调，全县教育均衡发展。1980年，全县民办教师分批转为公办教师，为普及小学教育创造了条件，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稳定上升。1981年3月，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贯彻调整方针、尽快普及小学教育》的决定；同年5月，县文教局向全县教师发出了“为在八十年代普及小学教育而努力”的号召；9月，中共梁河县委作出了《把农村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到普及小学教育上来》的决定；同月，县文教局制定了《梁河县教育系统岗位职责》，为加强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982年，梁河县被评为云南省普及小学教育的先进县；1983年3月3日，《中国教育报》刊登了《县委重视、措施具体、云南省梁河县基本普及小学教育》的文章。是年8月梁河县委书记张国龙出席了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984年，全县有完全中学3所，初级中学7所，农职业中学及教师进修学校各1所，中学教职工426人，学生4902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1407人，占中学生人数的28.70%；小学268所，小学教职工1098人，小学生18644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6046人，占小学生人数的32.40%；幼儿园1所，小学附设幼儿学前班20个，幼儿教师28人，入园儿童616人；全县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30%，毕业率达91.50%，普及率达96%，基本达到国家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普及初等教育标准。1985年1月，经省、州检查验收合格，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发给了第一批普及初等教育的合格证书。《中国建设》杂志1985年第11期（英文版）以《一个边远县普及了初等教育》为题，向国外报道了梁河县普及了初等教育的

17

情况。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梁河县各级政府认真贯彻《决定》的精神,对梁河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推动了梁河教育的发展。1986年3月1日,梁河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梁河县教育改革问题的决议》。3月12日,县委、县政府批准了由县教育局拟定的《梁河县教育体制改革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全县教育实行学校分级管理(分县、乡、村三级管理)、校长选举任命、教职工定编聘请、教育合同、岗位责任等一系列新的管理制度。1987~1988年,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教师专业技术职称改革工作,有1345名教职工获得了不同级别的职称,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1985~1990年间,为巩固和发展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职业技术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办好县农职业高中的同时,先后在曩宋、小厂、河西、芒东、九保等乡中学开办了“三加一”(初中毕业后再加学一年的职业技术课)职业技术班,推进了梁河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为了改善办学条件,采取多渠道集资办学。据不完全统计,从1986~1990年,群众集资93.4万元,大批危房得到排除。校舍不足,课桌凳短缺的情况初步得到缓解。办好半寄宿制高小,为高寒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巩固普及小学教育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采取多种形式培训师资,几年来,通过教师离职进修、函授、电大、自学考试等方式培训,到1990年,全县小学专任教师866人中,具有中师、高中学历的586人(1980年453人),占67.7%,比1980年增加29.4%;中学专任教师347人,大专学历的195人(1980年50人),占56%,比1980年增长290%。教师学历达标率的提高,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奠定了基础。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到1990年,全县已为高等院校输送了大专生351人,为解放前20人的17.6倍,其中还未包括1950~1966年考入大专院校的47人在内。此外,从1977~1991年还有1900人考入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历年中专学校录取生数居德宏州各县市榜首。

到1990年止,全县有小学260所(其中民族小学90所),为1950年的6.7倍。在校小学生26238人,为1950年的13倍。适龄儿童14632人,已入学14499人,入学率达99.1%,年巩固率达97.4%,毕业率达94.5%。有普通中学10所(其中完全中学3所),农职业高中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幼儿园2所,填补了解放前梁河中等教育和幼儿教育的空白。在校中学生5489人,其中高中学生1027人(包括农职业高中241人)。全县中小学教职工1519人,是1950年的21.4倍。梁河教育,通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铸成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现有规模。梁河教育今非昔比。凡献身于梁河教育事业的历代英灵若能地下有知,定会欣然慰藉。有志发展梁河教育的后来之士,将继续开来,迎着21世纪新的挑战,为梁河的文明昌盛谱写更新更美的篇章。

大事记

清代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

腾越厅同知伊里布捐资在河西、盏西（现属盈江县）设义学各1馆。

清道光二年（1822）

腾越厅同知胡启荣捐资在萝卜丝庄（现萝卜坝地区）及四彝庄（今河西帮读、勐连及划归腾冲县的永勐、线多地区）设义学各1馆。

清道光八年（1828）

萝卜丝庄人尹开文中道光戊子举人。

清道光一十四年（1834）

河西帮读人尹艺（字树人）中甲午科举人。

清道光一十五年（1835）

遮岛人李佩乙（字行甲）与帮读人尹耕（字耘）同榜中道光乙未科举人。

清光绪五年（1879）

腾越厅同知陈宗海在四彝庄、河西等地区设立新义学14处。

清光绪六年（1880）

同知陈宗海在曩宋甲、茂福讯设立新义学各1馆。

清光绪七年（1881）

同知陈宗海在马鹿塘设立新义学1馆

清光绪十二年（1886）

李根源先生从杜子涛老师在九保太平寺北厢楼（后李将此楼改名为涵翠楼）私塾就

18